

# 名報人張季鸞

張若蘋

## 矢志向學圖報親恩

張季鸞，學名熾章，另有兩個筆名，一為「少白」，一為「一葦」。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西元一八八八年）三月廿日出生於山東鄒平縣，祖籍陝西榆林。他的父親張翹軒為遜清進士，性情高傲，主張「淡泊以明志」，一生刻苦自勵，生季鸞時正服官在山東濟南。張季鸞年十三歲，他的父親不幸病逝於濟南。他的母親王太夫人乃是織室，娘家在山東沂水，遽遭丈夫病故，家中頓陷困境，親戚朋友多勸她住在山東想法子謀生；但她堅持不肯，一定要攜帶幼子張季鸞千里跋涉，不辭風霜辛勞的扶着丈夫的靈柩歸葬陝西榆林老家。張季鸞自幼身體瘦弱多病，但却知道奮力進學，他的文思非常敏捷，往往下筆如飛，一氣呵成，因此他年紀雖小，在鄉里間却早負文名。回到故鄉後不久，適巧清廷綏綏道道臺陳兆璜到榆林任職，因為風聞張季鸞的文采，愛惜他的才華，就召他入府署唸書，又幫助他進味經書院跟隨咸陽名儒劉古愚學習。那時，張季鸞因專心向學，頭上已經有不少的白髮。他對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幾部書用的心力最多，也最有心得。

一九〇四年二月，張季鸞在三原宏道高等學堂肄業，入學才兩個月，就得到母親病逝的消息，他的母親死時年方三十七歲。張季鸞追念他母

親當年落葉歸根，帶他千里歸返原籍的苦心，就矢志向學，努力上進以報親恩。一九〇五年，陝西考選留日學生，張季鸞被錄取後，補習了一下日文，在一九〇九年赴日進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政治經濟，不久即加入了同盟會，回國後在于右任所主持的「民立報」工作。民國元年四月，臨時政府遷至北平，張季鸞與曹成甫一同前往北京創立民立報的分館，旨在南北一齊鼓吹建設民國。民國二年宋教仁遇刺事件發生後，北平民立報由於言論激昂，張季鸞與曹成甫都被袁世凱御用軍警逮捕下獄。曹成甫不久遇害，張季鸞則入獄三個月後，始獲釋放。南下到上海大共和日報工作，並在中國公學任教，講授西洋史，曾任新報省主席及農林部長的盛世才便是他當年的學生之一。民國八年張季鸞北上接辦北平中華新報，結果又因刊載安福系政府與日人秘商鐵道抵借二千萬元密約的新聞，觸怒徐樹錚；在徐樹錚封閉北平七家報館的行動中，張季鸞再次被捕入獄，於獲釋後再度南下主持上海的中華新報。

## 四不主義辦大公報

民國十三年冬，上海中華新報停刊，張季鸞復回到北方。這時他的留日老同學胡政之（霖）也到了天津，另一位留日同學吳鼎昌（宇達銓）則在天津主持鹽業銀行，由吳鼎昌出資五萬銀元

，於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接辦大公報，請張季鸞任編輯，胡政之任營業經理。

天津大公報是英欽之於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年）所創辦。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接辦之時，決心秉持英欽之當年「忠於事實、介紹輿情」的精神，繼續努力，並將他們議定的「四不主義」公開昭告於國人。所謂「四不主義」，一、是不黨。只站在公民的地位，發表意見，有利於國政的擁護之，有害於國家的糾彈之，絕不偏向任何一黨或團體。二、是不賣。不以言論來作交易或進階之工具，絕不收受一切帶有政治色彩的金錢補助。三、是不私。忠於報界輿論應盡之職責，為民喉舌之地位。四、是不言。不趨炎附勢，不順從一時衝動，昧於事實以立言。事實上，張季鸞自接辦大公報編務後，一切均照着既定目標，堅持原則，努力以赴。當民國廿五年九月一日，大公報紀念復刊十週年時，張季鸞虛心檢討得失，也自信以未嘗違背原則深自慶幸。

張季鸞的高瞻遠矚，獨具創見，可由他辦報的各種措施上窺見一斑。民國十九年十月特派旅行通訊員赴各縣鄉村調查民生狀況，揭發地方行政及官吏的許多弱點，呼籲政府當局加強整飭吏治，必能團結民心，阻遏共黨禍國意圖，為當時的中國報紙開啓了一項報導的新方向。民國二十年春，日本侵華的企圖已暴露無遺，七月十二日，

大公報曾刊載張季鸞所撰「再評日本之大陸政策」社論，其中指出：「苟日本以防俄爲其大陸政策之目標，則問題中心，全在中國。」他於此反覆強調：「中國與俄接壤萬里，而中國有四萬萬以上的人口，……是以防俄禦赤之道，端賴中國爲健全之發達，……如是中國物質上趨於繁榮，思想上歸於平靜，中國之力即足阻狂瀾之東流，爲遠東之保障，此中國之所望，應亦日本之所利也。不然俄勢東侵，而日本西進，赤白夾攻之下，中國現在社會之中堅分子，一旦不能抵禦實際思想上之各種侵略，則此茫茫大陸，甚且爲時代惡潮席捲而去……。」後來中日抗戰八年火拼的事實，演變成卅八年的淪陷，證明張季鸞的這一段話，實在是真灼灼見。不幸的是當時日本軍閥一意孤行，完全不曾顧慮到這一可悲的結局。

九一八瀋陽事變後，恣瀆戰役又跟着發生，張季鸞認爲以中日休戚與共，唇亡齒寒的關係，一定可以化干戈爲玉帛；因此，他仍不放棄給予日本朝野一個反省的機會，鼓吹化干戈爲玉帛。後來，和談雖告達成，但他已深深體驗到日本狼子之心，是很難加以遏止的。所以在瀋陽事變後的第二年，張季鸞就提出了長期抗戰的具體主張，他說：「中國屈無可屈，和無可和，只有陷於長期的頑強鬪爭；而積極經營西北，則爲長期戰爭必要之條件也。」基於長期鬪爭的大前提，政府必須有相當充分的應戰準備，才能戰勝敵人，獲得最後勝利；但當時若干野心家及共黨却積極煽惑學生運動，攻擊政府，製造糾紛，利用矛盾，想坐收漁利。張季鸞很不以爲然，他經常勸戒學

生們說：「對各黨之主張應先虛心研究，勿倉促參與。爲國士者應隨時準備爲祖國同胞受任何犧牲，但宜先充分發展自己精神的能力，得到確切不移的見解，然後與國人相見。」這也就是要青年們謀定而後動，不可盲目聽從別人的煽惑之言。他愛護青年之心，躍然紙上。

#### 四篇社論字字珠璣

民國廿四年春，張季鸞由津抵滬，曾在大公報服務過多年的名記者現任立法委員陳紀澄，特別去旅社中探望他，指出大家已激烈主張抗日，而大公報却還唱低調，將使報紙的銷路受影響的情況。張季鸞却笑着回答說：「你想想看，我們拿什麼跟日本打仗？我們的國防建設如此脆弱，經濟基礎也非常不穩固，中央正埋頭苦幹，力求內部安定……給中央一個從容準備的時間，不洩一時之憤，跟日本作最後清算，才能獲得勝利。」他接着又補充說：「大公報絕不盲目的投人所好，即使因此關上了門，也心甘情願。」這種深謀遠慮的國士風格，實在值得國人肅然起敬。

早在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之前，他就已看出共產黨徒爲了免於滅亡，圖謀喘息的機會，已在假抗日之名，暗中煽動各地野心軍人，製造寧端反抗中央。他在廿五年六月十二日的社論中曾提出：「中國今日的統一局面，乃以無量犧牲之代價換來，故惟有羣力維護此局面，而督促其進步革新，但不容野心者之勾煽破壞，再使統一返於混亂。此無他，以中國之國力，與環境之危迫，設復混亂，將無再建統一的餘

地。」張季鸞語重心長，發出警世之言，然而張學良和楊虎城却仍然發動了西安事變，把多難的中國，幾乎又再次帶入內戰及分裂的邊緣。

西安事變時，他連續寫了四篇社論，其中以「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文，最爲感人。且因文情並茂，大義凜然，政府曾加印了數十萬份，用飛機運到陝西散發在張學良、楊虎城駐軍的所在地；對於張、楊二人後來的幡然悔悟，發生了極大的效力。這一篇社論，真是字字珠璣，擲地有聲。

民國廿六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津、滬兩地的大公報都先後被迫停刊了。張季鸞決心追隨政府遷往大後方，因此他乃率領報館同仁，從天津南下到武漢籌備大公報漢口版發行的事，九月間漢口版即在戰火四處威脅聲中，繼續復刊了。他對政府接納他所建議的遷都移駐重慶的持久抗戰政策感到非常欣慰。日本侵華的軍隊一面正猛力進攻南京，一面又放出空氣，正請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與中國議和的消息。張季鸞隨即在廿六年十二月八日發表「最低調的和戰論」社評，請求政府堅持「日本不停攻南京，則決計不接受調解，不讓論和平」的最高原則。

他指出：「……日本現在一面奢言歡迎調解，一面在日本國內準備慶祝進佔我首都，這可以知敵人所調解的意義，只是慶祝勝利後的納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政府，肯接受他佔領我首都之所謂和議。因爲如此則省得製造傀儡，並且可藉我正統政府之力，以自消滅國內的抗戰精神，同時使國際上無法說話，這於他太便

利，太合算了。」同時他又呼籲：「我們在此危急存亡之日，請求全國軍隊，全世界共同維護住我衛國抗戰的最高統帥部之大旗，共同擁護蔣委員長於千辛萬苦之中貫徹送經聲明之國策。」這一社論發表後，給當時許多意志動搖，亟欲投敵的漢奸如汪精衛之輩一個當頭棒喝，一時還不敢四出活動。

### 克盡言責死而後已

當代名軍事學家蔣百里讀了他的文章後，曾向人表示：「季鸞這篇文章是大文獻，對日作戰應堅守一個原則，就是不跟他講和，最後一定戰勝它。」

民國三十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膠着階段，而當時友邦英、美兩國的態度非常模稜，對我國能否戰勝日本而統一，深具戒心。那時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大會，將要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中正委員長，照例需蒞會發表演說

## 美人名馬·佳話留痕

### 花落春猶在讀後

謝冰瑩

日本名作家厨川白村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真是一點不錯。當我拜讀蔣問鵬大姊的「花落春猶在」之後，印證這句話，一部好作品，真是由血淚交織而成的。

五十餘年前，我與問鵬相逢於上海，那時我們都很年輕，也都很窮，靠賣稿維持生活，記得有一次我去看問鵬和她的小兒子，不知道買點什麼帶去才好，伸手向口袋裡一摸，只剩一塊銀元，我只好送給小寶寶玩，回來我餓着肚子，那是在亭子間喝自來水過了三天的苦日子，現在回憶起來，實在太甜，太有意義了。

抗戰軍興後，問鵬與我都投筆從戎，她到十八軍任上校秘書，我組織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赴嘉定前線，問鵬能文能武，更能吃苦耐勞，她有一匹心愛的馬，據說馬很聰明，還能發現敵人摸哨，立了戰功，還得了勳章，一時有「美人，名馬」傳為佳話，也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戰地故事。

問鵬舊文學根基很深，能詩能文，抗戰前後，生活經驗非常豐富，寫作材料，俯拾即是；來臺北後，與兒孫共居，享天倫之樂，正是她著書立言的大好機會。雲林姊與我曾去看她，她很客氣，儘管行動不便，一定來回看我們，請我們去她府上吃飯歡聚。有人說：朋友如沙漠中的甘泉綠洲，真是千古名言。

問鵬大姊原籍浙江嘉興，曾負笈北平，因此她有南方小姐的溫柔秀麗，也有北方姑娘的豪邁慷慨，她服務軍中，做過公務員，記者，教員，生活多采多姿，讀她的文章，如見其人一樣地親切感人。西班牙有句諺語「好書如好友」，楊瑞先女士幾次向她的朋友和學生推薦「花落春猶在」，的確是一本值得文友們一讀珍藏的好書。（原載中央副刊）

，事前曾約晤張季鸞，詢問有關講詞意見；他乃特別申明「國防安全」的要義。蔣中正委員長接受了他的建議，在致詞時就發表了當時必須全國上下努力的兩大目標：「抗戰必須爭取最後勝利，建國必須達到絕對安全」，既鼓舞了民心士氣，也因此改正了國際視聽。民國二十三年張季鸞已發現罹有肺病，二十七年肺病更加厲害，到了民國三十年，因一直無法好好醫治療養，終於在九月六日一病而逝了，享年五十七歲。翌年，全國新聞界把他的遺體運到陝西，公葬在西安竹林寺。

張季鸞一生獻身大眾傳播的新聞事業，自清末民初以來，即以代表全國同胞，宣達民族意志為己任；在軍閥橫行的民國初年，雖曾兩度入獄，而其樹立報人人格，創造新聞道德的決心，絲毫不變。民國廿七年，于右任為紀念他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在北京入獄的廿五週年，曾作了一首「雙調折桂令」：「危哉季子當年，灑淚桃源（即哭宋教仁，因宋為湖南桃源人），不避艱難。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心肝。弔民立餘香馥郁，說袁家黑獄辛酸，到如今大戰方酣，大筆增援。廿五週同君在此，紀念今天，慶祝明天。」這首詞寫出當時新聞界的處境，也道盡了張季鸞肯運正義之筆，作社會導師的大無畏精神。張季鸞一次在他的演說中曾經提到：「我的人生觀是很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張季鸞對當代社會國家所作的貢獻，真是影響至鉅。古人有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而張季鸞真可當之無愧了。